

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 追寻智慧

冯契哲学思想研究

杨国荣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追寻智慧

冯契哲学思想研究

杨国荣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追寻智慧：冯契哲学思想研究 / 杨国荣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

（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4816 - 3

I . 追... II . ①杨... III . 冯契(1915~1995)—哲学思想—  
研究—文集 IV . B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2875 号

## 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追寻智慧

—— 冯契哲学思想研究  
杨国荣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顥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2 字数 319,000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2,300

ISBN 978 - 7 - 5325 - 4816 - 3

B · 621 定价：3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序“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高瑞泉

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可谓方兴未艾，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绝对算不上新鲜的话题。坊间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批评论著，从哈贝马斯到查尔斯·泰勒，从福柯到夏尔·波德莱尔，说明“现代性研究”本身作为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思，如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热情。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之后的世界，精神之芜杂和意向之分歧。不过，我们组织编纂出版这一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刊，并非只是泛泛地参与到对时代核心问题的讨论之中，而是自觉地意识到现代性研究中两个相互勾连的环节：第一，“中国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视域中的人文学术。它们构成了本丛书所措意的核心对象，希望以此为中心来贡献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中国的现代性”的概念，以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之存在为前提。与早期的现代性研究者的观点不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单一性不是现代性的正确摹写。哈贝马斯说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不过 18 世纪的黑格尔不仅是一位

欧洲中心论者，而且是德国中心论者，中国则完全在他的总体历史之外。本世纪第一年，哈贝马斯应邀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在午宴上盛赞中国，说他站在东方明珠顶楼眺望上海，感到自己正在“世界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world)。让人领略这位理论大师在社交场上的机敏与魅力，也让我们这些东道主的虚荣心得到无伤大雅的满足。当然“中国的现代性”之被重视，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或“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还因为我们对中国经验具有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不但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合乎辩证法的理解，而且真正面对了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个历史节点：只有当经济合理性和官僚合理性(即认知—工具合理性)明显占据统治地位时，现代社会的病症才会暴露出来。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与世界日益被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相比，使用文化概念来重塑本土现代性的努力是无足轻重的。譬如詹姆逊就认为，人们谈论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和儒家的现代性等的时候，会忽略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当讨论到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时候，许多人会实际上承认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代性：詹姆逊就几乎同意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说法，即世界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引起普遍的文明，如像斯密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允许种种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同于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彼此之间也互不相同。它造就的政权通过恢复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获得现代性，而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因此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就像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多种失败的方式一样。

与单一现代性理论所依靠的历史单线进化论预设相反的是，二次大战以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出现了另一种状况，渐渐实现现

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大多拒绝了与现代西方完全同质化的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民主化、个人主义、家庭变化、都市化、工业化、现代教育、大众传媒，到处都看到西方化的影子。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那样：这些东西得到的定义和组织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建制类型和意识形态并不相同，所以多重现代性是对这样的客观情势的一种肯定性描写；诸多文化规划不断得到建构和重构。从全球看，在现代和现代化的社会里，在现代化的各个阶段甚至可以看到更加多样的具体的制度类型。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近代中国尽管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并未真正沦为殖民地国家；她的悠久而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在与殖民主义对抗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意识的强化剂，它曾经与意识形态的目标相结合，或者直接诉诸文化创新的力量，来改写现代性的社会设计。更进一步说，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内在问题的知识化过程，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问题在当下条件中的自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理性规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应当在它的历史向度中表达当代人的批评精神和理论创造。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深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之迫切与重要，并且已经有若干重要著作问世；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的现代性”的专门研究，总体上远不及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介绍和翻译之规模。因此，将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本丛书的研究对象，自然表示了一种提倡和一份努力。

把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与人文学术发展联系起来，是本丛书的又一重目标。众所周知，现今中国的人文学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经过 20 世纪的转变，尤其是取法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科学，由此纳入现代学院体制，成为现代学术形态的知识系统。如果我们同意现代性是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结合的

话,那么人文学术多多少少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认,至少表达了现代性自我确认的努力。我们知道,现代人文学科的形成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密切联系,现在汉语称做“人文学”,英文翻译为 the Humanities 的那些科目,在 15 世纪意大利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这一套科目,它们当然也包括了要学这些科目就必须具备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虽然直到 19 世纪初才出现“人文主义”一词,但是后来人们普遍接受了像布克哈特那样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将人文主义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即将现代人文学科中的新态度和新信念称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显而易见,西方人文主义,不管其普遍性如何,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知识。事实上,数百年来,以欧洲现代性为中心的世俗化人文主义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动。

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人文学术当然有她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但是以古代“四部”之学为内容的传统学术,早就经历了 20 世纪的巨大变革,虽然并未完全变成绝学,毕竟已转变为现代学术的知识形态。且不说,当代中国精神的主流已经是这两股变动之流的不同程度的融合,即使是人文教育中引人注意的中国经典阅读的新实验,也实际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对古代经典做现代诠释。这种诠释或者是强调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民族特点的人文主义原则,或者是用一种普遍的人文主义来解释中国经典。无论是关于重写学术史的呼声,还是若干年前开始的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回顾,其实都体现了对人文学术的反省意识和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创造。它的最近走向似乎与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之旨趣有某种内在的契合。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现代性的自我矛盾、自我分裂,在人文学

术的处境变化中获得充分的表露。西方人文主义并未能幸运到能逃避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因而它自身就是分裂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是“人”,它转变成现代性的哲学表达就是主体性,但是后现代主义今天不但宣称哲学根本上要放弃追求那个大写的“真理”,主体性消失了,甚至说“人已死了”。与此相伴的是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与市场机制的扩展,迅速地改塑着人文学科的空间,即使是学院体制内部也不能幸免。人文学术今天的悖论是:一方面人类因为迫切需要生产一种创新文化和提供作为选择的独特生活方式而特别需要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生产不仅受制于内部的观念冲突,而且受制于外部的生存条件。如何破解这个悖论,实在是现代性研究的关键之一。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提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本丛书以此为目标,并不表示怀抱着短时间内就对它展开全面研究的雄心,而只是在提倡以一种持续、局部的具体问题之研究,尝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地逼近这个目标。对于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无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还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学术,都是道地的“为己之学”。所以我们不但相信,假以时日,这项研究一定可以积微为著,有助于我们整体理解现代性而且相信即使是局部的,以个案为中心的工作,也自有其内在的价值。

## 序　　言

冯契先生不仅作为哲学家建立了一个受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哲学体系，而且作为哲学教育家和科研单位领导，对上海，尤其是华东师大和上海社科院的哲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冯契先生 1935 年考取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先赴延安，后去昆明。1944 年 9 月从西南联大毕业，受聘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的哲学和逻辑学讲师，开始其职业哲学家生涯。1946 年 8 月他从昆明来到上海，先后在同济大学、上海纺织工学院、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任教或兼课。1951 年 10 月，华东师大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在大夏大学等高校及院系的基础上成立，“文革”后担任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的周抗担任华东师大的首任党委书记。冯契先由大夏兼课转为师大兼课，后被正式聘为师大教授。1953 年，学校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冯契担任副主任。1954 年，华东师大政治教育专修科改为政治教育系，冯契担任副系主任。1955 年，学校举办哲学研究班，选拔袁运开等 5 名理科优秀青年教师，加上政教系的青年教师丁祯彦，在冯契指导下阅读哲学原著、研究哲学问题。丁祯彦后来成为华东师大哲学研究所的所长，袁运开在担任校领导（先为副校长，后为校长）之前，则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负责人。这两个所

分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中期与张天飞担任首届系主任的华东师大哲学系整合,构成华东师大哲学学科的主体。

华东师大的哲学系所都成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这以前,冯契参与建设的专业哲学研究机构,主要是上海社科院的哲学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成立于 1958 年 9 月,其哲学所成立于 1959 年 8 月,由院党委书记李培南兼任所长,冯契兼任副所长。哲学所的基础是社科院原有的哲学教研组,主要以研究现代哲学问题为主,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史和逻辑学三个研究组,1961 年增设自然辩证法研究组。那时的上海社科院设在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离华东师大和冯契先生在华东师大一村的寓所很近。冯契就在当时还相当冷僻的沪西一隅埋头研究、教学,包括开设列宁《哲学笔记》系列讲座、主持编写中宣部项目《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海版及后来的华东版)、编修《辞海》哲学条目、指导两个单位的青年同志,等等。

但好景不长。1964 年 10 月冯契被安排去安徽参加“四清”运动,次年被派往北京参与撰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文章,第三年 5 月则爆发了“文革”,冯契在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相继被斗,数百万字的手稿、更多的写作准备资料,被从家里抄走,从此下落不明。

但幸好,“文革”中关门停办的上海社科院的命运,比冯契的这些手稿要好些。1978 年 5 月,中共上海市委正式同意着手重建社科院;10 月 11 日,市委正式任命社科院领导班子,冯契兼任社科院副院长(直至 1984 年 1 月)。冯契除参与院部一些会议以外,主要在哲学所参加由所长周抗负责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教学工作。在冯契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全国首批申报学位点的时候,社科院哲学所获得了 4 个硕士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华东师大政教系获得了 2 个硕士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哲学)、1个博士点(中国哲学)。冯契同时在社科院和师大指导学生、开设课程。张天飞所藏的冯契讲解列宁《哲学笔记》的油印记录稿,成为“文革”前冯契哲学手稿中的仅存者,冯契在此基础上再次系统讲解“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逻辑问题”,同时新开设了其他一些课程。冯契去世后出版的10卷《冯契文集》中,多半的内容在这些课程上讲过。其中,长期成为华东师大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教材、实际上构成其三卷《智慧说》之雏形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最初就是冯契在淮海路为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研究生讲课的记录。

冯契先生留给我们的财富不仅是这些有形的文字,而且是他的无形的精神。为说明这一点我想引用先生晚年的三封信。

在1978年4月26日的一封信中,时年63岁的冯契写道:“年龄虽然大了,只要持之以恒,搞上10年,写100万字著作(当然不在字数,要真正有点价值的)留赠后人,也就是不枉此生了。”<sup>①</sup>

在1991年8月19日一封信中,76岁的先生写道:“我的学生说我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这话大概不错。我确是想用我的著作来培养人的理想、信念、德性。现实走着自己的路,是个必然王国。人的理想面对着现实,往往被碰得粉碎,变成像流星那样,一闪即逝;或者算是实现了,却变了形,完全不是原来所想像的那样。原封不动地实现的理想是很难找到的。即使如此,人还是需要理想。这是人的尊严所在。”<sup>②</sup>

收在《冯契文集》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95年1月20日,也就是他去世前38天。冯契先生写道:“我几次讲到世纪之交中国

---

① 《冯契文集》第十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第320页。

② 同上书,第363页。

可能进入自我批判与‘反思’阶段(王元化大概也是这个用法),这是期望。系统地从各方面进行‘反思’,是下一代人的事。我们若能开个头,那就是尽了历史的责任了。”<sup>①</sup>

“价值”、“理想”、“责任”,冯契先生在这三封信中似乎不经意地使用的这三个词,再恰当不过地概括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尤其是他辉煌的晚年。从1978年到1995年,从63岁到80岁,冯契先生仅独立撰写的著作就有两百万字。他确实留下了“真正有点价值的”东西,实现了对其革命理想和学术理想的追求,尽了他对中华民族和哲学事业的历史责任。

前辈尽了责任,接下来就是“下一代人的事”了。冯契先生去世已过十年,进入新世纪也已有数载,冯契先生的那个期望,即系统、全面地反思一个半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哲学史,完成得怎么样了?了解冯契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所说的“自我批判”和“反思”,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回顾、资料汇编和文本诠释,而是如荀子之于先秦哲学、王夫之之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或者说黑格尔之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之于资本主义时代,需要一支贯通古今、汇合中西,把历史和逻辑结合起来、把综合与创新统一起来的如椽之笔。当然,以一人之力擎持此笔的巨匠,有赖于诸多因素相遇而无法以常规之法求之。但是,形成一个既相互争辩又彼此尊重、既弘扬传统又面向世界、既遵守规范又勇于创新的学术共同体,则不仅会提高产生此类巨匠的机会,而且有希望用集体智慧提升个人创见。

2005年11月1日至3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

---

<sup>①</sup> 《冯契文集》第十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

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上海师大哲学系、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等学术机构联合举办“冯契与 21 世纪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以学术讨论的形式纪念我们共同的学术前辈，弘扬我们共同的学术传统，营造我们共同向往的学术共同体——一个宽容但不敷衍、进取但不浮躁的学术共同体，一个努力为民族、为人类创造价值、追求理想、履行责任的学术共同体。

童世骏

2006 年 5 月 31 日

**丛书主编** 高瑞泉 王晓明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明 王家范 朱政惠 余伟民  
陈大康 陈子善 陈嘉映 杨国荣  
高瑞泉 盛邦和 童世骏

# 目 录

序 言.....	童世骏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		
——读冯契的“智慧说”.....	许全兴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重温《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胡振平	19
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		
杨国荣	26	
扩展认识论的两种进路.....	郁振华	44
论冯契的德性思想.....		
陈 来	64	
“自觉”与“自愿”		
——关于冯契先生伦理思想的一段往事及感想		
杨泽波	83	
从“圣人”到“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崔宜明	89
道德的真诚如何促进真理的发现		
——从冯契先生论“真与人生理想”说开去.....	吴根友	99
冯契的人生理想学说.....	王向清 余 华	108
智慧化的人格关怀		
——论冯契的终极关怀思想.....	顾红亮	123

---

《智慧说三篇》中的评价论思想.....	陈新汉	136
试论冯契价值哲学中的功利原则 ..... [日本] 樋口胜		154
论冯契先生对辩证逻辑的重要贡献.....	贺善侃	165
“概念的双重作用”及其在论证理论中的意义		
——对冯契一个观点的引申与应用 .....	晋荣东	182
论精神在智慧学中的本体论意义.....	郭美华	202
中国近代对本体论态度的转变		
——从金岳霖到冯契.....	林孝瞭	221
久在科学中,复得返自然		
——从道家观点看冯契的自然原则.....	贡华南	233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陈卫平	248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李维武	266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贡献		
——从哲学史定义说起.....	朱义禄	284
论冯契的世界哲学思想.....	臧 宏	291
整体主义与进步意识		
——冯契中西哲学比较观述要.....	方旭东	313
附录: 冯契未刊记录稿两篇		
一、关于价值导向问题 .....		350
二、功利与精神传统 .....		356
后 记.....		362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

——读冯契的“智慧说”

许全兴

冯契(1915—1995)教授不仅是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哲学家；不仅是一般的哲学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智慧说”(《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篇)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于一体，自成一家之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智慧说”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讨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很有必要去读一读冯契的“智慧说”。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新形态

我最初研究毛泽东哲学，之后拓展到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1992年由北京大学调到中央党校后，又发展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